

清代赣南的田面流动与乡村金融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40)

【摘要】文章利用新出版的南康县契约文书,从田面流动与乡村金融的关系入手,发现清代南康县或赣南西部地区通行“田面转让式借贷”,与浙江南部“当田式借贷”模式相同,利率相近。清代后期,由于赣江—大庾岭—广州商道的中断与废弃,这一区域陷入资本流动性短缺,借钱还钱、借谷还谷式借贷风行,利率飙升,商业凋零。

【关键词】田面权;田面转让式借贷;乡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054-15

The Circulation of Topsoil Rights and Rural Finance in Qing-era Southern Jiangxi

CAO Shu-j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recently-published contracts from Nankang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rculation of topsoil rights and rural finance. In doing so, it discovers that Nankang County, and perhaps southwestern Jiangxi more broadly, engaged in a lending practice patterned after topsoil transfers, or “topsoil transfer-style lending.” This form of lending is comparable to the “mortgage-style lending” found in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and accrued similar interest rates. With the fall of the Qing, commercial routes between the Gan River, Dayuling, and Guangzhou were cut off and abandoned. Southern Jiangxi was faced with liquidity shortages, and began to denominate its loans in money or in kind. As a result, interest rates rose and commerce suffered.

Key words: topsoil rights; topsoil transfer-style lending; rural finance

一、引言

如果不包括账本,赣南地区的契约文书至少可以分为八大类:土地买卖、赋役、租赁、借贷、借条与收据、分家书、合同与商业票据等。如欲研究传统中国的地权结构,土地买卖文书是主要且可靠的资料来源。由于土地买卖涉及价格、借贷、利率等问题,所以,土地买卖文书也是研究乡村金融主要且可靠的资料来源。

最近十多年来,契约文书的大量面世,为传统中国地权结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在方法上,人们突破传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分法,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权利束概念,更加细致地分析传统地权结构中处置权、收益权与使用权的分解与组合,对中国南方地区的一田二主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①。最

[收稿日期] 2020-04-08

[作者简介] 曹树基(1956—),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

① 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修订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近,我们证明,在华北及北方地区,也存在与南方类似的一田二主结构^①。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地权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地权分割导致的地权分散。

通过对于新出文书的深入分析,传统中国地权结构中蕴含的乡村金融亦呼之欲出。例如,我们证明了“典租”现象在闽南地区与闽西客家地区的普遍存在。所谓“典租”,指的是在借贷市场上,债务人以地租充抵贷款利息,直到债务人缴还本金,债务关系结束^②。这一现象,与浙南山区以“当田”为主要内容借贷方式稍有不同。比较而言,典租者以地租偿还借贷利息;当田者则以土地为抵押,以地租充抵贷款利息^③。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地权结构的特点之二是以土地典当与地租典当为特征的乡村金融。

本文以新近面世的《客家珍稀文书丛刊》中收录的江西南康县朱坊乡李姑堡萧氏、谢氏文书为例,讨论田面的形成及其流动,以推进传统中国地权结构与乡村金融关系的研究。

南康县清代属于南安府辖境,亦为南安府附郭之县。南康居于章江之滨,章江与贡水在赣州城区汇合后形成赣江北上。鉴于清代前期赣江—章江—大庾岭—广州商道的重要性,南康县的商业地位极其重要。就农业与手工业而言,甘蔗种植与榨糖是当地重要的基础产业,至今依然。

虽然南康的地权结构与乡村金融,与浙南、福建等地并无不同,但南康契约的书写方式及契约的组合方式,则大不相同,理解困难。本文通过对于南康契约深入分析,加深我们对于传统中国土地市场、金融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本文所引萧氏、谢氏等姓文书计有契约210余件,文书的时间起自乾隆五年(1740),止于1959年^④。本文以清代为时段,不涉及民国及1949年以后。在方法上,本文首先确定契约的性质,再讨论各类契约中隐蔽的利率。

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其一,“粪草”与一田二主;其二,不完整田面之断卖;其三,田面之出典;其四,完整田面之断卖;其五,完整产权之转让。

二、“粪草”与一田二主

(一)“粪草”的性质

在南康县及赣南的契约文书中,“粪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体现一田二主的地权结构。试读案例1:

立批字人萧云灿兄弟,今有上坝仔鸭婆下坳等处土,要批与他人,有李定贤向前承批耕种,当日三面言定,递年实还土税铜钱壹千陆百文正,其土□开成田,照田还租,如有土税不明,听凭萧宅召佃耕作定矣,不得异言,日后不耕,送回土主,不得私行别退,粪草异说,自批之后,管得用心耕作,不得抛荒失界,今恐无凭,立批字为照。

乾隆五年三月初九日立批字人 云灿、宇灿、德和、简儒

中见人 张似崇、肖渊明(P3)^⑤

① 景文玉、曹树基:《土地产权与20世纪50年代的“富农倒算”——以山东L县李绪海倒算案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林胜强:《一田二主:中国北方的地权结构》,待刊。

② 曹树基:《典地与典租:清代闽南地区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③ 曹树基、李霏霏:《清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 曹树基、陈支平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卷。

⑤ 曹树基、陈支平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第42卷,第3页。本文引用的契约皆来自本书,故下文引用时仅标明页码。

本案中的“批”意为租赁,“土税铜钱”为地租。作为佐证,另有《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胡芳州立赁耕字》中记载山租亦称为“山税”(P140),政府征收之税则称为“熟粮”或“粮米”之类。本契约定佃耕者在土地开垦成田后,向田主交纳地租,每年纳租1600文。如果不能按期按量纳租,萧家有权收回土地,另外召佃耕作。假如以后李氏不再承佃,则须将土地交还萧氏,不能自己转佃给他人,更不能拥有“粪草”。

所谓“粪草”,在赣南及福建的许多地区也称为“粪质”或“粪土”,说的是佃农B从田主A手中佃入土地,进行耕作。假定这块土地产量为稻谷200斤,B每年向A交纳稻谷100斤,B自己拥有稻谷100斤。经过几年的劳动,佃农B培肥土地,使瘠土变为良田,产量提高,年产稻谷400斤。B除了向A交纳100斤地租外,尚余稻谷300斤。多出来的200斤稻谷,是佃农B对土地投入的回报。假定B自己不想耕作,将土地转佃给C,C每年向B交纳租谷200斤,B再向A交纳租谷100斤,自留100斤。B自留的100斤稻谷也称“田皮”或“田面”,亦称“粪质”“粪土”或“粪草”。

在政府册籍上,这块土地的业主是A,A每年向政府交纳田税。在一般的“田主—佃耕者”的结构中,B不可能不经A的同意,将土地转佃给C。然而,在“粪草”结构中,如果A不同意B的转佃行为,欲收回土地的全部产权,那么,A就要补偿B在耕作中使土地升值的部分。否则,只能同意B的转佃行为。在案例1中,萧氏事先约定,尽管这块土地还没有开垦成田,但却是依开垦成田后来计算地租的,即佃耕者在开垦时的工本投入已经反映在租金里。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土地而言,这块土地的租金是偏低的。因此,在退佃时,佃农李氏没有主张田地升值的权利。

在理论上,采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A、B、C之间的关系。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权利束理论,将土地产权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则可知在案例1中,萧氏拥有土地的全部处置权、部分收益权,李氏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只有部分收益权和使用权,

在“粪草田”中,A与B均拥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和收益权,B还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如果B将土地转佃给C,则C拥有部分收益权和使用权。正因为“拥有土地处置权者即是田主”,所以,“粪草田”的性质是“一田二主”。A为田底主,B为田面主,C为佃耕者,其结构为“田底主—田面主—佃耕者”。

开垦或培肥土地,使土地增产,从而形成“粪草”或田面,是一田二主最主要的起源方式之一。在南康县,可以采用“回租田”的方式补偿开垦之工本,详见案例2:

立言明字人萧君握,今因言明本家兄有苍名下刘屋冈溪口上边沙丘中洲开辟成回租田,当日言定耕作肆年,年满之日,交回租田,有苍自己耕回,君握不敢算回饭食、工资、锄头、粪草钱文,亦无霸耕阻挡异言等情,其田原系白手开田,并无分厘批退钱文,此据。

中见兄 玉树

代笔亲 彭慎行

道光元年正月初十日立言明字人 君握(P51)

在本案中,萧有苍名下有片沙洲,言明由萧君握开垦成田。双方议定,开垦成田之后,由萧君握耕种4年,充抵开垦中花费的各项工本。4年期满后交还萧有苍耕种。为什么是4年,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的时间,容后文讨论。

(二)田面的转让

南康契约中存在大量的“退”契。凡“残缺产权之转让”皆可称为“退”^①。产权之所以残缺,是因为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田底主与田面主共享土地的处置权与收益权,就是产权残缺最典型的特征。

案例3:

立永退字人周志芳、学绿,今因要钱应用,无从出办,叔侄二人商议,愿将先年赁得肖宅田东名下租田五斗,坐落地名……要行出退与人,先尽亲房人等不受,赁中说合到肖美石亲识向

^① 曹树基、李楠、龚启圣:《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前承退耕作为业,当日得受时值工本退脚价钱贰千柒百文正,每年实还租谷五斗正,即日钱约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退之后,听凭肖姓过手永远耕作还租,周姓不得霸耕阻挡,再无不敷,不得尽找取赎异说,其田实系已受分之田,亦无重退抵当之说,系二比情愿,并无勒逼贪谋等情,一退千休,如有来历不明,不干承退人之事,自有出退人之当,今欲有凭,立永退字一纸为据。

嘉庆四年十二月廿八日立退字 周志芳、周学绿

说合中 位西

代笔侄 席儒(P30)^①

在本案中,虽然这块土地是周氏“先年赁得”,即以前从“肖宅田东”处租来,其实,“其田实系已受分之田”才是本质性的。据此,可知这块田是周志芳叔侄从志芳父亲、学绿爷爷手中继承所得。所谓“先年”,有可能是周志芳父亲,也有可能是世代更早的祖先。从肖氏手中租来的土地可以继承,可以转让,说明周家叔侄拥有对这块土地的部分处置权。“肖宅田东”是田底主,周氏是田面主。当周家叔侄转让土地时,先找周氏亲属,再找肖美石,而周氏所得“工本退脚价钱”就是“粪草”即“田面”的价格。

在一田二主的结构中,交给田底主的租称为大租,南康称为“地租”,交给田面主的租称为小租,南康也称为“化利”或“华利”,疑为“花利”之误。详见案例6。本文从俗,不予改正。本文假定,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大租与小租相等,根据大租,即可知小租。这一点,详见本文第六节。

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本案中的交易了。周志芳叔侄将田面转让并在收取“工本退脚钱”2700文后,还规定肖美石每年须向“肖宅田东”纳租谷即大租5斗;同时意味着周氏也将小租即化利5斗的收租权转让给肖美石。每年5斗稻谷的价值则是2700文的利息。关于利率的计算,详见下节。

案例4明确记载两种不同的地租:佃耕者一方面给田底主交租,一方面给田面主交租。

立借耕字人萧有瑜,今来借到亲识钟卿名名下租田肆担正,坐落土名老屋里门首营内下节,一连四丘,其田界照,依暂约内所载,壹并承借耕作,当日言定,每年除租之外,实还利谷肆担伍斗正,其谷至秋乾燥,过车租桶,交量明白,不致少欠升合,如有化利不清,听凭钟姓自己耕回,萧姓不得霸耕阻挡,今欲有凭,立借耕字为照。

见借□□

嘉庆拾陆年正月二十二日立借耕字人 有瑜(P35)

本案中的萧有瑜,应当是案例2中的萧有苍。本案除了4担地租即大租外,还有4.5担“利谷”即小租,“利谷”即“粪草”。萧氏则是佃耕者。据此,萧氏合计每年纳租谷8.5担,推测这块土地的年产量大约为17担。

在田面、田底分化的同时,田面、田底本身也可能被分割。田面之分割详见下节案例6与案例8,田底之分割见于订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案例5:

立永退字人郭深谋,今因要钱应用,无从出办,夫妻兄嫂商议,自愿父手遗下租田捌担正,每年实还廖姓额租谷壹担正,坐在地名李姑堡竹松坑田一连……一併要行出退与人……送与谢凤连兄弟向前承贴,永远耕作为业,当日言定,时值退脚田价钱贰拾千文正……一退千休,永无翻找取赎……(P86)^②

依南康之俗,“租田”即田面,“租田捌担正”则大租8担,意味着还有小租8担。“额租”意为“原额之租”,“每年实还廖姓额租谷壹担正”说明大租已经开始分化,为廖姓购去了1/8,或廖姓出售了7/8。在本

① 为节省篇幅,引文省略了土地的四至八到。下文在引用时,视情况也可能省略契约中“不得尽找取赎异说”一句以后的部分。这是因为,只要判断契约是断卖还是出典。断卖是“永退”,回赎则有时间之约。

② 同书第85页收录了一份郭深谋立永卖契退字,时间也是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在场人、中人,以及代笔者均与本契相同,然所卖土地租谷8斗,不存在田底主,没有写明价格,故判断这份契约是份没有成交的草契。

案中,田面转让的租谷数量不详,参见对案例9和案例10的分析。

总之,在南康县,“粪草”就是对土地耕作者开垦土地、培肥地力、增产粮食的回报。“工本退脚钱”也是“粪草”即田面的价格。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见到过完整的田底、田面的之转让,但没有发现部分田底与部分田面之转让,“工本退脚钱”对田底、田面的分割,导致了地权的更加零碎化。此外,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的讨论多集中于田底主与田面主,很少涉及佃耕者。在南康县文书中,一批佃耕者的出现,实为意想不到之收获。

三、不完整田面之断卖

如果说案例5呈现的是田底的分割,本节案例6与案例8则讨论田面的分割。其他案例还进一步讨论不完整田面的转让方式,包括断卖与出典,进而讨论不完整田面转让的利率。

(一)不完整田面之断卖

在南康契约中,已知“租田某某担”指的是大租,在未说明的情况下,小租与大租相等。关于此点之证明,详见本文第六节。然而,有一批契约记载交易的租谷少于大租,且承退人继续向立退字人纳租。从字面上看,承退人在付钱的同时还要每年纳租,不合情理。

案例6:

立批退字人胡克明,今有己置租田伍担正,坐落土名庵潭尾,上以沛然田为界,下以山脚,左以沛仁田为界,右以河勘为界,要行批退与人耕作,有萧德和向前承退耕作,当日得到工本退脚银五两正,言定逐年实还租谷肆担五斗正,其租谷舂到送河,租桶过扫交量,自退之后,不致短少租谷,如有短少,其日听凭胡宅另召佃耕,肖宅不致异说,今恐无凭,立批退字一纸永远为照。

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立批退字 胡克明

说合中人 萧宁远、萧简儒

代笔人 萧肇人(P4)

在本案中,“批退”的性质是出租,却又不是完全出租。胡克明的“己置租田”共有大租5担,意味着小租也是5担。胡克明将这块田面出租给萧德和,得到“工本退脚银”5两正。萧德和每年向胡克明交纳租谷4.5担,少交的5斗,可以看作5两银子的利息。如有短少,胡克明可以抽佃另召他人耕作。这说明,乾隆八年(1743),胡克明只是以断卖的方式出售了他的田面的10%,即5担租田中的0.5担。这意味着,采用“工本退脚银”转让的方式,可以将田面进行灵活且不断的分割与转让。

案例7:

立卖契人胡玉响,今因要银别业,自愿将父手所置己分关约内租田伍担正,原粮玖升,坐落土名庵潭尾等处,要行出卖与人,其田原买萧德和之业,请中侄观兰送回德和赎回,当日言定时直纹银叁拾叁两正,就日银契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卖之后,听凭萧宅收粮完纳,日后胡宅永无异言……

再批明原萧德和老契一纸,一时难寻,日后寻出,付还肖宅,胡宅充为故纸,永不行用。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立卖契人 胡玉响

说合中侄 观兰、吴西厓

在场人 谨行、李弘启、郭锡林(P11)

从时间上看,胡玉响是胡克明之子。在案例6中,胡克明将这块位于庵潭尾的土地田面的十分之九出租给了萧德和。在案例7中,胡玉响又将这块土地“卖”给了萧德和。不过,案例7中有“其田原买萧德

和之业,请中侄观兰送回德和赎回”一句,说的是在乾隆二十六年之前,萧德和已经拥有了这块土地的全产权,由于某种原因,萧德和在乾隆二十六年之前的某一年,将这块土地出典给胡氏,现在,萧氏赎回这块土地。因此,案例7中的“卖”,其实是胡氏之回赎。据此可以肯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块土地一直在胡氏与萧氏两家之间转让。

于是,可以进行以下假定:乾隆八年之前,胡氏是这块土地完整田面的拥有者,萧氏则可能是这块土地的田底权人。乾隆八年,胡克明收取了5两“工本退脚银”,而付出“工本退脚钱”的萧德和还要每年交纳4.5担租谷,说明乾隆八年之前萧德和交纳的租谷更多。同时,还意味着乾隆八年之前,萧德和既是这块土地的田底权人,也是这块土地的佃耕者。换一种说法,在乾隆八年之前的某一年,萧德和将自己一块全产权土地(在有些地方亦称底面田)的田面,出售给胡氏,萧氏向胡氏交纳地租则是萧氏所收“工本退脚钱”之利息。

如果在时间上进行一些假定,就可以完整地叙述胡家与萧家之间的产权变动史了。由于缺钱使用,乾隆元年(1736),萧家将自己一块全产权土地的部分产权,以“工本退脚钱”的方式转让给胡氏,并以交纳地租(多于4.5担)的方式支付所获“工本退脚钱”之利息;于是,萧家成为这块土地的田底权人,胡氏成为田面权人。乾隆八年(1743),胡家出售部分田面给萧家,萧家每年还须交纳4.5担地租给胡氏。乾隆十五年(1750),胡氏将这块土地剩余的田面全部转让给萧德和,萧德和重新拥有土地的全部产权。乾隆二十年,萧氏又以33两银子的价格将这块土地出典给胡氏,胡氏重新成为田面权人。乾隆二十六年,萧氏以原价将土地赎回。萧家再次成为这块土地的全产权人。

案例8显示了一块土地的实际交纳地租大大少于额定地租的状况:

立批退字人萧升佐,今有已手续置租田捌担正,坐落地名……要行出退与人,有本家侄德和向前承退耕作,当日得到工本退脚银叁拾两正,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实还面车乾燥租谷肆担正,大小丰歉,两无添减,其租谷随时舂到送河,租桶交装,如有租谷短少,将纸内工本银扣算,其田听凭叔另召别佃批退,侄不得异言霸耕,亦无秋耕粪草异说,今恐无凭,立批退字一纸永远为照。(P9)

本案与案例6相同。“已手续置”的租田,是自己购买的田面,而不是继承所得。“批退”的性质为田面之出租,却不是完全出租。具体地说,萧升佐将自己的一块田面,一半出租,一半断卖,其所得银30两,是8担田面租谷中4担的价格,即萧升佐每年以4担地租作为30两银的利息,另外4担则是萧德和向萧长佐交纳的地租。

本契还规定,如果萧德和不能如数纳租,萧升佐可以抽佃另召他人耕作。萧德和不但不能霸耕不还,还不能提出“粪草”的要求,即不能私行将土地转佃,并获得额外收益。也就是说,对于萧德和承佃的4担租田,他没有拥有“粪草”的权利。

(二)不完整田面断卖之利率

如果“工本退脚钱”利息就是相应的地租,那么,通过谷价的计算就可以得出其利息率。计算利率需要用到几个参数。其一,银钱兑价,本文采用的是林满红整理的数据^①。这一数据虽然是采用几个地区数据拼接而成的,但用石仓账本中的银钱兑价数据与其校勘,两者的匹配性相当好。所以,从整体上说,清代存在统一的银钱兑价市场,区域市场是全国市场的一部分。其二,米价数据采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代粮价数据库》。其中嘉庆年间南安府数据缺,则根据乾隆至道光年间米价增长的线性关系进行插补。道光及道光以后的数据来自《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②

^① Man-hong Lin,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2006, PP86-87.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0-190页。

一般说来,清代的石是150~160斤。在南康县,没有“石”,只有“担”。由于南康县的“担”与“斗”、“升”配套,所以,南康的“担”即“石”,与石仓相同。设每担160斤,每斗16斤,每升1.6斤。

关于利率计算,如果我们知道田面主B通过转让租谷得到的铜钱,他付出的租谷的价格就可以看作其所得铜钱的年利,即租谷价格/转让价格 $\times 100$ =年利率。因此,在契约的阅读中,读懂契约中各个行为人所扮演的角色,厘清租谷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案例6中,受退人萧德和本应交纳租谷5担,由于交纳了5两“工本退脚银”,所以,他只需要交纳租谷4.5担。少交的0.5担租谷可以看作5两银的利息。乾隆八年(1743)银钱兑价为800文,5两银子兑钱4000文,是年二月南安府每石米价值银1.28两,每石谷价0.9两(1.28×0.7),值钱720文,每斤谷价4.5文($720/160$)。5两银子可以购买稻谷890斤($4000/4.5$),0.5担稻谷即80斤稻谷是890稻谷的9%。也就是说,案例7中的胡克明通过租谷抵扣,只用了9%的利率,获得5两银子的贷款。

在案例8中,乾隆二十二年(1752)银钱兑价850文,米价1.48两。依上例计算得出谷价每斤5.2文,4担租谷640斤,值银3328文,占工本退脚钱25500文(30×850)13%。

在案例7中,典价33两银,正常的田面价应当是典价的一半,约为16.5两;所以,这5两银只是部分田面价,而非全部田面价。假定从乾隆八年至乾隆二十六年土地价格不变,对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萧德和来说,这块土地的典价实为银子28两($33-5$),折钱23800文(28×850)。是年5月米价每石1.7两,折合每斤谷价6.3文,720斤稻谷(4.5×160)值4536文(720×6.3)。也就是说,萧德和收入的土地出典价格是以转让出去的地租价格为代价的,地租价格是土地出典价格的19.1%($4536/23800$)。

在上文讨论的三个案例中,只有案例6和案例8属于不完整田面之转让,因案例7与案例6相关,才值得讨论如上。概括地说,不完整田面的利率大约为10%,表明田面主以较低的利率从佃耕者手中获得贷款(押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下文表明,南康以土地为抵押的借贷利率约为20%,比案例7略高。

如果这一结论可以得到更多个案的支持,或许就可以说,在“田底主—田面主—佃耕者”的结构中,佃耕者是最弱势的群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地位是一成不变,以案例6和案例7为例,胡氏与萧氏两家的地位在不断地转化,前几年的田底主,过几年可能成为佃耕者,或者,田底主可以兼佃耕者,而田面主也可以同时也是佃耕者。市场化的流动的地权结构与阶层的流动是一致的。

四、田面之出典

从理论上讲,当一块全产权土地分割为田底与田面之后,田底也可以分割为部分田底,如案例5所示。田面的分割则见上文。不仅如此,实际上,田底与田面出典后,就可以视为不完整田底与不完整田面。因为,出典后的田底与田面可以各拥有两个田底主或田面主。本节讨论田面出典后形成的不完整田面。

(一)田面之出典

在南康县,凡是写明“暂退”之契,都是出典,即有回赎权的转让。所谓田面转让,仅指以原价赎回的田面转让。依此原则,在本户契约文书中,共检得13件田面出典之契,各项参数,详见表1。

表1 清代南康13件完整田面出典之利息率 单位:文

时间	米价两/石	立契人	银钱兑价	地租(斤)	每斤谷价	地租价	工本	利率(%)
乾隆四十三年(1773)	1.45	萧心一	950	96	6.0	579	5000	11.6
嘉庆廿五年(1820)		萧惟明	1226	160	12.0	1920	5000	38.4
道光五年(1825)	2.225	胡显春	1253	320	12.2	3903	29000	13.5
道光十二年(1832)	2.325	石明清	1387	320	14.1	4515	12000	37.6
道光廿九年(1849)	1.975	胡贵华	2355	320	20.3	6512	10000	65.1

道光三十年(1850)	1.965	萧荣盛	2230	1280	19.2	24539	15000	163.6
咸丰元年(1851)	1.965	春龙牯	2230	336	19.2	6441	4200	153.4
同治十年(1871)	2.215	萧善余	1850	320	17.9	5737	12000	47.8
光绪三年(1877)	2.465	萧馨远	1510	96	16.3	1563	8000	19.5
光绪五年(1879)	2.625	萧芳兰	1420	1296	16.3	21135	32000	66.0
光绪五年(1879)	2.625	萧芳兰	1420	400	16.3	6523	23900	27.3
光绪八年(1882)	2.765	谢光淮	1470	320	17.8	5690	10000	56.9
光绪三十三年(1907)	2.835	谢泽凤	1370	4000	17.0	67969	394560	17.2
合计				9264	17.0	157026	560660	28.0

说明:光绪三十三年谢泽凤出典土地,所收为“银边肆百毫正”,即400元,每元折银0.72两。

在表1中,至少有2例的地租价值约为典价的1.55倍。也就是说,A向B借钱1000文,每年利息1550文。如此高的利息,违背了常识,因此,有必要详加讨论。

案例9:

立暂退字人萧荣盛兄弟,今因要钱应用,母子商议,自愿将祖手遗下分关书内租田捌担正,坐落地名老屋里……一併要行出退与人,先尽亲房人等不受,请中送与本房锡和叔向前承暂,永远为业,当日得受时值暂价钱壹拾伍千文正,即日钱约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暂之后,听凭叔锡和过手耕作,侄荣盛兄弟等不得霸耕阻挡异言,其田言定随年办回愿(原)价,对期取赎,两无刁难,如有上手来历不明,不干承贴人之事,自有出笔人一力承耽,当付分关一本载明,今欲有凭,立暂退字为照。

说合中 兄 积庆 兄 铭盘

道光三十年拾贰月廿七日立暂退字人书 荣盛(P104)

由于言定“随年”即第二年赎回,所以,契文中的“永远为业”就是套话,当不得真。本契交易的程序是:萧荣盛兄弟急需用钱,向其叔萧锡和借钱15000文,抵押的地租价值24539文,是为贷款的1.64倍。

其实,二天以后,萧荣盛又与萧锡和订立一借耕字,兹命名为案例10:

立借耕字人萧荣盛,今来借到本家叔锡和名下田一处,地名、田丘、界址,照依退约内载明,所载一併承耕作,当日言定每年除租粮之外,每年实还化利车谷叁担正,倘有大小丰歉,两无添减,其谷乾燥□□以上,租桶交量明白,不少升合,如有化利不清,任凭叔锡和另借别耕,侄荣盛兄弟不得霸耕阻挡异言,今欲有凭,立借耕字为据。

见借人 兄 铭盘 弟 建平

道光叁拾年拾贰月廿九日立借耕字人 荣盛(P105)

据此可知,在案例9中,萧荣盛兄弟将田暂退给萧锡和,但同时又从萧锡和手中借回这块田地自耕。“租田捌担”之外的“化利”3担,才是15000文之利息。依此路径,萧荣盛兄弟可以将其田面不断地分割,零拆细卖,以维持自己的现金流。在本案中,萧荣盛兄弟虽然需要向田底主交纳地租8担,但那是田面之租,与利息无关。不过,以3担作为借贷利息,年利仍然高达61.3%。这仍然是一个足够高的利率,原因不明。

其实,案例4与案例10类似,说的是萧有珪从钟卿名手中借来土地耕作,而这块土地正是萧氏退给钟氏的,所以,其文中也有“其田界照,依暂约内所载,壹并承借耕作”一句,可惜缺失了相关的“暂退字”。细加寻觅,发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萧良闲立借耕字》与案例4相同,借耕之田也是“退约内田”,也同样找不到退约原件。(P129)与此类似的还有《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萧甲茂立赁耕字》

(P158)、《光绪四年十月胡龙生攷立赁耕字》(P159),都找不到配套的退约原件。

再看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十四日春龙牯立暂退田契,兹命名为案例11如下:

立暂退字人春龙牯,今因要钱应用,无从出办,母子商议,愿将父手所暂租田壹担贰斗正,坐在地名土寮下……每年实还罗姓特租谷壹担贰斗正,凭中说合,送与本家兄兼善承暂耕作为业,当日得受时值暂价钱肆千貳百文正……其田随年对期取赎,交回原价……(P120)

春龙牯是这块田的田面主,罗姓为田底主。春龙牯交给田底主的租谷为1.2担,这意味着田面的化利谷也可能有1.2担。如果将全部化利谷作为借贷4200文之利息,利率高达153.4%,殊不靠谱。联系案例9和案例10思考,春龙牯将田面出典之后,也又可能再借回土地耕作,另外再议定给本家兄兼善的地租。所以,本案不宜将4200文视为全部田面的价格,应当视为部分田面的价格。

依照这一思路,《光绪五年二月三十日萧芳兰、萧华表等立暂退田字》,兹命名为案例12,也可作同样的理解。本契出典之田有两块,一块田的租为5.4担,一块田的租为2.7担,合计8.1担,田底主为刘姓,借钱32000文,随年对期取赎。(P160)如以为8.1担租谷为32000文之利息,利率高达66%。仍疑此契有配套之借田契,双方议定以合适的地租充抵,利率应当更低。

由于在下文的分析,可以解释且能够接受的个案的年利一般不会超过60%,因此,如果删除表1中年利超过60%的4例,其他9例的平均年利率降至19.7%。

(二)借条中的利率

留存至今“暂退约”数量不少,与之配套的“借耕字”十分罕见。案例13是一份订立于同治四年(1865)萧坚庆立借耕字:

立借耕字人萧坚庆,今来借到都公堂叔锦邦、锡和、蔚亭、元盛名下众田,坐落地名叶屋树下双合丘田,壹连贰丘,其界址照依契退约内界明,一併承借耕作,当日言定每年实还田利车谷陆担正,其谷早、翻二次,干燥过桶,交量明白,不少欠颗粒,自借之后,用心协力,不可抱慌实界(抛荒失界),如有,日后田利谷不情(清),听凭众内另借别耕,坚庆不得霸耕阻挡异言,今欲有凭,立借耕字为据。(P137)

本契与案例10相同,萧坚庆将田面退给都公堂之后,再重新承借耕作,原来的土地,在退约内界明,每年还谷6担,分早稻与双季晚稻两次交还。其中“田利车谷”指的是用风车扇净的“化利”之谷。光绪九年(1883),萧坚庆又立一张借字,兹命名为案例14:

立借字人萧坚庆,今借至高祖都公堂荣振、蔚亭、遇富三人所管钱本拾伍千文正,当日言定每年实还化利车谷叁担正,其谷限早、翻二次干燥过车,租桶交量明白,不少升合,如有利谷不清,愿将己手所接地名下田心门首石街丘契内田,任凭都公堂内或耕或退,抵还本利,坚庆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借字为据。

当批明附石街丘契一纸。此契自己借回印。(P172)

本契形式上与案例10和案例13稍有不同,萧坚庆没有为借贷专门订立一暂退契,却将这块田之契约作为附件交给了债权人——一个管理高祖都公堂的三人委员会。借条本应保存在债权人手中,萧坚庆自己复制了一份,存在手边。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份借条就是这份复制件。本契清楚地说明,借钱还谷,还的是化利之谷,即田面所产之谷,田面也是这笔贷款之抵押。

光绪九年(1883)银钱兑价1630文,每石米2.56两,每斤谷价18.3文($2.56 \times 1630 / 160 \times 0.7$),3担谷价合计8231文,占15000文的54.9%。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利率。

从契约中寻找到13件借条,其中有7件借钱还谷的,包括案例13在内,都是与“暂退约”有关的借贷;还有3件借钱还钱,3件借钱还谷。本文将这三类借贷统称为“钱谷式借贷”,其各项参数见表2。

表 2		清代南康 13 件借条中的利率						单位：斤、文		
时间	性质	立契人	银钱 兑价	米价 两/石	借还谷	每斤 谷价	借入 总价	利息	利率 (%)	期限
同治元年	借钱还钱	郭秀康					5000	1500	30.0	一年
光绪三年	借钱还钱	叶礼有					7000	2520	36.0	一年
宣统元年	借钱还钱	萧便佳					2000	720	36.0	一年
光绪十年	借谷还谷	萧宝光	1720	2.365	320		5695	1424	25.0	不详
光绪廿四年	借谷还谷	张作栋	1200	2.235	120		1408	692	38.1	一年
光绪廿六年	借谷还谷	吴联奎	1220	2.315	240		2966	990	33.4	每年
光绪六年	借钱还谷	萧遇富	1440	2.925	96	18.4	3000	1769	59.0	每年
光绪九年	借钱还谷	萧坚庆	1630	2.565	480	18.3	15000	8780	58.5	每年
光绪十年	借钱还谷	萧宝光	1720	2.365	160	17.8	5000	2847	56.9	每年
光绪十七年	借钱还谷	萧名珍	1530	2.125	80	14.2	2500	1065	38.1	每年
光绪廿五年	借钱还谷	萧鸿渐	1200	2.315	160	12.2	5000	1823	36.5	每年
光绪廿九年	借钱还谷	萧利行	1280	2.625	400	14.7	12500	5880	47.0	每年
宣统三年	借钱还谷	萧傅伦	1730	2.995	32	22.7	1500	725	48.4	每年
合计							68568	30736	44.8	

将谷折算成钱,便于统计分析。在这 13 件借条中,最低利率为 25%,最高 59%,超过 50% 的有 3 件,没有一件超过 60%。平均借贷利率为 44.8%,大大高于表 1,也高于表 3。

分类统计,借钱还钱与借谷还谷之年利率约为 30%~36%;借钱还谷的则可能在 36%~60% 之间。如果说借钱还谷可能因谷价折算导致误差,但本人对于闽南典租利率之计算,采取的是同一方法,所得平均年利率只有 13% 左右。之所以不完全否定接近 60% 的高利率,是因为我们在案例 10 中,就见到过同样的情况。

总之,案例 9 与案例 10 的配套出现,不仅令我们找到了一柄理解契约文书超高利率的钥匙,亦让我们发现南康文书中隐蔽的不完整田面之存在。从总体上说,“田面出典式借贷”利率大大低于“钱谷式借贷”利率。

五、完整田面之转让

比较而言,在南康县,完整田面之转让大大多于不完整田面之转让。在标准的完整田面转让契中,地租与“工本退脚钱”可以一一对应,利率也在合理的范围。

(一)完整田面之断卖

南康县的完整田面转让,大多采用断卖的方式。凡是写明永退、杜退或卖的“租田”,基本上都是完整田面之转让。唯一需要小心处理的,就是看看契约中是否写有回赎字样,如无回赎,则为断卖。

案例 15 表明大租与小租相等:

立杜退字人王崇宏、敬仁,今因要钱别业,无从出办,母子兄弟商议,愿将祖遗父手已分租田肆担,每年实还额租四担正,坐落……一併要行出与人,先尽亲房人等不受,凭中说合到本里亲识肖琢良向前承贴耕作为业,当日得受工本退脚钱壹拾叁千文正,即日钱约两交明白,自退之后,任凭肖宅过手永远耕作,还租王宅,不得霸耕阻挡,尽找取赎异说,此系二比情愿,非是贪图准折,今欲有凭,立杜退字一纸永远为据。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立退字人 王崇宏

在场叔 龙行、添枢、感而

说合中 萧玉佩、王感而(P19)

本契说的是立契人王崇宏等从祖先一父亲手中继承租田4担,每年交给某田底主租谷4担,这就是“额租”之意,推测王崇宏收入的小租亦为4担。将此田面断卖给肖氏后,肖氏需要继续交纳大租4担,此即“任凭肖宅过手永远耕作,还租王宅”之意,而不用再交的小租4担则是王氏借贷13000文的利息。是年银钱兑价985文,每石米价1.56两,计算得出每斤谷价6.7文($985 \times 1.56 / 160 \times 0.7$),4担即600斤租谷价值4034文,年利率为31%(4034/13000)。

案例16至案例18均与萧有瓓有关。案例16:

立卖契字叔萧桂生,今因要银应用,无从出办,自愿将父手所遗关书内租田贰担五斗正,载粮肆升,坐落……四至界明,并工本退脚一概要行出卖与人,凭中说合到堂侄有瓓向前承买为业,当日得受时值田价钱叁拾壹千文正,即日钱契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卖之后,听凭侄耕作还纳,叔不得异言等情,日后不得尽找取赎之说,俱系二比情愿,非是贪图准折,今欲有凭,立卖契一纸永远为照。

乾隆肆拾柒年十月立卖契叔 桂生 同男 位西

中 刘周学

说合 叔 于乔 □ 定三

□□ □□□兄 永旭(P18)

这是一份标准的完整田面转让之契。立契人萧桂生从父亲手中分家得来的“租田”即田面,大租之额2.5担,推测小租之额亦为2.5担,断卖之价31000文。这意味着萧有瓓投资31000文,每年回报稻谷2.5担。依上例计算利率只有7.6%。

本契立契人还包括萧桂生之子萧位西。又觅得一份《乾隆□□年萧位西立永卖田契》,兹命名案例17。立契人卖的是“父手关书内租田壹担”,价格8000文。同样是卖给萧有瓓。该契中只记载“乾隆”,没有具体年份,估计应为乾隆五十年发生之事。这一年,位西家亟需用钱,不得不再卖一块田面,得价8000文(P29)。依上例计算,年利率约为13.4%。

又有《嘉庆十九年十二月王添炳立永退田字》,兹命名为案例18。萧有苍断买田面租谷12担正,付款46000文(P41),年率43.8%,以前的亏损可以补平。

由此可见,在流动的市场化的土地市场中,可能只有某种形式交易的低利率,没有针对某个人或某类人的低利率。

(二)完整田面断卖之利率

依时间先后将本户契约中的28件完整田面断卖之契的各项参数列如表3。

表3 清代南康县28件完整田面断卖之利率 价格:文

时间	立契人	米价 两/石	银钱 兑价	租谷(斤)	每斤 谷价	地租价 (文)	工本 退脚	年利率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萧桂生	1.43	940	400	5.9	2352	31000	7.6
乾隆五十年(1785)	萧位西	1.56	985	160	6.7	1076	8000	13.4
乾隆五十年(1785)	王崇宏	1.56	985	640	6.7	4302	13000	33.1
乾隆五十年(1785)	萧谷丰	1.56	985	800	6.7	5378	24000	22.4
乾隆五十年(1785)	达五	1.56	985	640	6.7	4302	34000	12.7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彭光德	1.82	1020	192	8.1	1559	6500	24.0

嘉庆四年(1799)	周志芳		1033	80	8.1	648	2700	24.0
嘉庆十年(1805)	谢永盛		936	400	8.5	3400	68000	5.0
嘉庆十一年(1806)	萧化育		963	320	8.7	2784	15000	18.6
嘉庆十八年(1813)	萧又京		1090	133	10.5	1400	4300	32.6
嘉庆十九年(1814)	萧素存		1102	266	11.1	2948	8600	34.3
嘉庆十九年(1814)	萧化育		1102	80	10.5	840	3400	24.7
嘉庆十九年(1814)	王添炳		1102	1920	10.5	20160	46000	43.8
嘉庆廿十年(1815)	萧美石		1133	80	11.2	896	2700	33.2
嘉庆廿二年(1817)	萧惟明		1217	1280	11.2	14336	64000	22.4
嘉庆廿三年(1818)	周履吉		1245	448	11.8	5286	18500	28.6
道光六年(1826)	谢学诗	2.27	1271	120	12.6	1511	7000	21.6
道光七年(1827)	廖居广	2.43	1341	432	14.2	6146	42000	14.6
道光九年(1829)	萧植宗	2.445	1380	1280	14.8	18895	53000	35.7
道光十四年(1834)	石南斗	2.205	1363	213	13.1	2805	16500	17.0
道光十四年(1834)	谢李氏	2.445	1356	160	14.5	2321	9000	25.8
道光十八年(1838)	谢兰清	1.925	1637	160	13.8	2206	24000	9.2
道光十八年(1838)	萧存荣	1.925	1637	160	13.8	2206	48000	4.6
道光廿四年(1844)	余春发	2.145	1724	80	16.2	1294	17000	7.6
道光廿五年(1845)	谢乃成	2.025	2025	320	17.9	5741	18000	31.9
道光三十年(1850)	张福五	1.965	2230	330	19.2	6319	18000	35.1
同治元年(1862)	谢尚居	1.715	1210	146	9.1	1327	14500	9.1
同治十二年(1873)	张福五	2.195	1720	233	16.5	3841	10000	38.4
合计			11473	11.0	126280	626700	20.2	

说明:由于乾隆年间的样本较少,几份只记“乾隆”,没有具体年份,均作乾隆五十年处理。只有年份,没有月份,均作十二月处理。

在这28件“田面断卖式借贷”契约中,最低的年利只有4.6%,最高的为43.8%,平均年利20.2%,比不完整田面转让之年利要高得多,与表1中调整过的“田面出典式借贷”利率相近,比表1中的“钱谷式借贷”利率低得多。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萧存荣立永退田并山岗字》命名为案例19。萧氏除了将田底主为王氏的1担租田转让外,还包括“白鹤塘塘面上山岗壹块”“又大窝仔山岗壹块”“又刘宅屋背早窝仓塘面上山岗壹块”“又白鹤塘左手塘边上土地壹块”“又白鹤塘口下荒土地壹块,以及山内栎林竹木、桐头木梓、松杂草皮俱一等项,一并要行出永退与人。”(P82)合计有5块山场荒地林木。如果加上这些地块,利率应大幅增加,不会是4.6%。

《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谢永盛、谢毓秀立永退田字》命名为案例20。2.5担的租田,卖出68000文的高价,利率只有5%。细读契约,关于这宗土地的四至,有“至河唇为界,其水照依老额天车水,古坡古圳,通行灌荫,一并要行出退与人”(P32),是一处临河且灌溉条件极好的高产稻田。价高利率低,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

排除两个极端且可以解释的低利率案例,则其余26例“田面断卖式借贷”的平均年利为19.5%,较未调整过的数据略有下降。

至此,我们可以将“田面出典式借贷”和“田面断卖式借贷”概括为“田面转让式借贷”。排除掉极端

情况后,“田面出典式借贷”和“田面断卖式借贷”的年利率约为20%,故可将“田面转让式借贷”的年利率视为20%,比“钱谷式借贷”利率低得多。

六、完整产权之转让

本文的主题在于田面与乡村金融,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完整产权转让过程中,仍然存在与利率相关的问题,以致于不得不对一批相关契约讨论如下。

(一)完整产权之鉴别

订立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一份永卖契见案例21:

立永卖契字人谢绍甫,今将所买租田赁壹担正,每年租谷玖斗正,实载应征熟粮贰升陆合正,坐在地名……凭中弟文质说合,送回弟仙桂向前承买掌管,耕作为业,当日得受时值卖价铜钱肆千文正,即日钱契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卖之后,其田听凭弟永远掌管耕作,兄永无翻找取赎异说,此系二比情愿,并非贪图等情,其粮在于子二图九甲谢永昌户花名传柱项下,任凭过割还纳,一卖千休,粮清价足,并无留存,今欲有凭,立卖契永远为照。(P81)

这份契约提到的“租田”不是继承,而是买来的。通常我们将南康县之“租田”,理解为田面,然本契永卖之后,还可以“过割”,即转移田底之权。契文将粮户之名,交待得清清楚楚,所谓“过割”,就不是虚指。很显然,这里的收租9斗,指的是立契人谢绍甫所收之租。道光十六年每斤谷价16.8文,9斗租谷合计144斤,合计价格2419文,占卖价4000文的60.5%。

虽然土地断卖与土地出典并不相同,但是站在谢绍甫的立场,两年的租谷即是土地的价格,过于昂贵。站在其弟谢永远的立场,购买土地的成本,可以在两年中收回,实在便宜。这令人联想起本文案例2中,萧君握以耕种四年的代价充抵开垦的成本,以每年25%的利率计算,他已获得他所开垦土地的全部价值。以每年20%的利率计算,他已获得他所开垦土地的80%的价值。这就是“工本退脚钱”的价值与意义。

再看订立于光绪二年(1876)的案例22:

立卖租契字人彭文达全弟其俊二人,今因要钱应用,无由得便,兄弟商议,自愿将分授己分关内额租柒斗五升正,应征熟粮米捌合正,在于一厢图六甲万胜户花名科余项下,其田坐在……送到亲识石正荣兄弟向前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言定,实得时值价钱贰千贰百文正,即日钱契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卖之后,任凭石宅人等割粮过户,完纳耕作掌管,永远为业……一卖千体,永无翻找取赎不敷之说……

与案例18相同,出卖的对象也是“额租”,粮户花名亦交待得一清二楚,自卖之后,依然可以割粮过户。计算其地租,0.75担租谷为120斤,是年每斤稻谷价格17.4文,共值2088文,是为2200文卖价的94.9%。

最离奇的还是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二十九日订立的案例23:

立暂退字人谢光泮,今因要钱应用,无从出办,父子商议,愿将父手遗下己分之业粮田,坐在地名……共计谷田一担五斗正,载粮米一升正……一併要行出暂与人,说合送到本家弟光汾父子向前承暂耕作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暂价铜钱贰千伍百文正,即日钱约两交明白,不少分文,自暂之后,任凭光汾父子过手耕作,五年之满日后取赎,照依约内原价接回原田,二家不得争多减少异言,今欲有凭,立暂退字为照。(P170)

本案明白地写作“粮田”而非租田,就说明本田是骨皮合一之田,亦即一田一主之田。光绪八年,田

主谢光泮需要出典土地,一旦完成出典,则骨皮分离,承典者成为田面权人。所以,并非田皮转让称为“暂退”,土地出典形成田皮也可称为“暂退”。是年银钱兑价 1470 文,每石米价 2.765 两,折算每斤谷价 17.8 文,地租 240 斤,值钱 4272 文,是出售价格的 1.71 倍。

行文至此,还是没有解决案例 21 与案例 22 的产权性质,但就利率而言,联想到案例 9 与案例 10,推测在“立暂退字”的后面,一定还有其他配套的租赁文书。如此,案例 21 至案例 23 中的超高“利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一事实也提示我们,在南康,各种形式的地权转让中,都存在契约之间的相互配套。正确地理解南康的契约系统,才是解读南康契约之关键所在。

(二)“租田”与“粮田”

本节继续讨论案例 21 与案例 22 的产权性质。关于赣南的租田与粮田,《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称:赣南田亩有租田、粮田之别。粮田者,皮骨无分,其租谓之华利;租田则由于前代兵燹之后,户口逃亡,田地荒废,外籍人民自由插标占领,招人开垦,占有者占有土地所有权,对于垦户收租,于国家纳粮,而对于该田则不能转佃,亦不能收回自耕,谓之管骨。承垦者世世耕作,按年纳租,其赁耕权可以自由转佃,自由典(谓之暂退)、卖(谓之杜退),谓之管皮^①。

在南康,“租田”就是指一田二主之田面或田皮,粮田则指皮骨合一之田,亦即一田一主之田。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从“割粮过户”的情节考虑,案例 21 与案例 22 揭示的似乎都是完整产权之田,却都没有采用“粮田”一词。此外,《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强调田底主由外籍移民构成,本文强调田底主招民开垦,开垦形成田面,两者并不矛盾。不过,《民商事习惯调查录》认为田底主不能收回田面自耕,本文则证明田底主可以通过买入田面,从而形成皮骨无分。《民商事习惯调查录》认为“华利”即本文讨论之“化利”是粮田之租,亦即一田一主之租,本文则证明“化利”是面田之租,而且有时是部分田面之租。

回到案例 23 的讨论中来,契中所载“共计谷田一担伍斗正”不是地租,而是产量。“载粮米一升正”即为 0.01 担,税率为产量的 0.7%(0.01/1.5×100)。从本户契约中觅得 15 件有地租与税记载的“租田”数据,又觅得 5 件有产量与税记载的“粮田”数据,详见表 4。

表 4	清代南康县地租、产量与农业税的关系				产量:担
时间	立契人	田的性质	地租或产量	税粮	税率(%)
乾隆四十七年(1782)	萧桂生	租田	2.5	0.040	1.6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彭光德	租田	1.2	0.011	0.9
乾隆 年	胡玉响	租田	5.0	0.090	1.8
乾隆 年	萧位西	租田	1.0	0.018	1.8
乾隆 年	达五	租田	4.0	0.060	1.5
嘉庆十八年(1813)	萧又京	租田	1.0	0.018	1.7
嘉庆十九年(1814)	萧素存	租田	2.1	0.037	1.8
道光五年(1825)	胡显春	租田	2.0	0.050	2.5
道光六年(1826)	何钦召	皮骨租田	0.8	0.020	2.4
道光十六年(1836)	谢绍甫	租田	1.0	0.026	2.6
道光廿十年(1840)	郭深谋	租田	0.8	0.080	10.0
道光 年	胡禄士	租田	0.3	0.007	2.8
道光 年	胡自新	租田	0.8	0.020	2.5
光绪二年(1876)	彭文达	额租	0.8	0.008	1.1
宣统元年(1909)	谢泽凤	租田	9.0	0.240	2.7

① 司法行政部编印:《民商事习惯调查录》,1930 年,第 419-420 页。

小计			32.3	0.725	2.2
同治 年	彭能忝	粮田	4.0	0.015	0.4
光绪三年(1877)	谢光朋	粮田	0.5	0.002	0.4
光绪八年(1882)	谢光淮	粮田	2.0	0.020	1.0
光绪八年(1882)	谢光洋	粮田	1.5	0.010	0.7
光绪三十三年(1907)	谢泽凤	粮田	25.0	0.220	0.9
小计			33.0	0.267	0.8

说明:本表中有些数据有些并未出现在表1~表3,是因为本表只考虑地租、产量与粮米,价格有缺者依然收入。

排除道光二十年(1840)郭深谋10%的超高税率不计,其余14件“租田”税率平均为租额的2.1%,而其他5件“粮田”税率只占产量的0.8%。假定南康县的农业税率是一致的,那么,“租田”产量应该是租额的2.625倍。在这个意义上,案例21与案例22记载的是地租而非产量,其性质是租田而非粮田。采用“租田”口径,案例23的地租应为0.57担,即5斗7升。由此可见,相对于民国年间的调查,采用契约文书本身进行检验是有意义的。

七、讨 论

在南康县或赣南西部地区,如果说“粪草”即田面是对土地耕作者开垦土地、培肥地力、增产粮食的回报;那么,“工本退脚钱”可以田面进行分割,导致地权更加分散。虽然在“田底主-田面主-佃耕者”的结构中,佃耕者是最弱势的群体,却并不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地位一成不变。地权结构的市场化流动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一致的。

田面的分割与流动,不仅是地权的分割与流动,更是资本的组合与流动。从结构上讲,田面权人可以通过田面的分割与转让,获得急需的贷款。这一点,成为南康或者赣南有特色的金融模式。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在“典租”模型下归纳乡村金融的方式:一是以石仓为代表的“当田”,与土地的联系紧密,抵押借贷的性质明显。一是以闽东北、闽南、闽西南及赣南等地为代表的“典租”借贷,土地抵押的性质不明显。一是徐州的“当空”,是与土地无关的借钱还谷。三种不同的典租或金融模式,体现了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融通的水平与方式^①。

主要采用田面出典或断卖的方式,或采用全产权土地之出典的方式进行借贷,都可以归纳为“田面转让式借贷”,与浙南地区以土地以抵押的“当田式借贷”基本相同,而与闽南地区以地租作为贷款利息的“典租式借贷”大不相同。前两种模式与土地的联系紧密,后一种模式与土地的联系则不紧密。与土地联系紧密的贷款年利率大多在20%左右,典租式借贷的年利率在13%左右。在浙南的石仓,以租付息的“当田式借贷”年利只有10%,与闽南“典租式借贷”接近。

这样就出现悖论:从金融市场的发育过程看,与土地的关系越紧密,借贷的年利率越高;然而,在南康县,与土地的关系越紧密,借贷的年利率越低。当然,由于南康县的“低”,差不多就是浙南地区的“高”,因此,还要寻找其他更加有力的解释。

本文证明,“田面断卖式借贷”利率同于“田面出典式借贷”利率,大大低于“钱谷式借贷”借贷利率。从表1至表3,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田面断卖式借贷”终结于同治年间,“田面出典式借贷”则一直维持以前的水平,而“钱谷式借贷”则主要是从光绪年间发展起来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同治年间南康或赣南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可能导致利率水平的提高。(下转第13页)

^① 曹树基:《典地与典租:清代闽南地区的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